

道德中国

盛世隐忧

- 罗荣渠 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
- 王力雄 中国文化结构的解体与劫数
- 王力雄 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
——我们这个世纪的劫难
- 丁学良 救救大人
- 何清涟 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
- 王跃生 关于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观点
- 刘小枫 中国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
- 刘小枫 当代中国伦理秩序中的宗教负担
- 何怀宏 经济发展会带来道德进步吗？
- 陈勤奋 “乱世”笈

●对未来中国，最真实的前景和最深刻的危机，并不在经济、政治方面，而是文化结构的解体。单纯的经济、政治都在社会的浅层次 即使有危机也不难度过 但文化结构解体所导致的精神紊乱，却会从根上毁掉一个社会。

—— 王力雄

●在这十多年商品大潮的强力冲击下，商品拜物观念已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以致教养、文化水准很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之不道德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

—— 何清涟

●鲁迅世纪初喊出“救救孩子”震撼数代国人。然当今中国救心要务似乎并不是救救孩子，而是救救大人！孩子们接受的文明的普遍准则，尚未广泛地被现实的虚伪所毒化，反倒对大人的行为有净化作用

—— 丁学良

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

□ 罗荣渠

○ 重视经济转轨引起的人文生态变化

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加速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转轨。随着经济的转轨，文化也必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转轨，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文化。从发展战略来看，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全民族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问题上，增长热掩盖了发展的一切层面，直到最近两三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下的人文忧思才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前的高速经济增长引起了文化层面的快速变化，并出现新的发展势头，诸如：群众性文化消费的巨大提高，世俗文化的兴起与风格多样化，旅游、饮食、服装、影视等商业文化的涌现，书刊音像市场一派活跃，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空前增多，等等。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令人忧虑的文化滑坡、教育滞后、人文素质下降等突出现象。略加归纳如下：

1. 教育滞后，特别是基础教育面临困境：从 1980 年以来每次经济大热都周期性地冲击文化教育事业。最严重的是 1993 年第三次危机，出现空前未有的大面积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总计达 14 亿元之多，至今仍有一小半未兑现。大量教师流失，1992 年达 45 万人。学校经商成风，教育行为被严重扭曲。

2. 社会风气奢靡化 知识层相对贫困化 在经济生活向小康迈进的同时 拜金主义、超前消费、色情服务、游戏人生 都在同步增长。早已绝迹的黄色垃圾与迷信活动又大量卷土重来。文化消费庸俗化 格调低下。礼貌、公德、见义勇为与奉献精神大倒退 贪污腐化与声色犬马之娱大上升。大城市养宠物之风日增。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上千亿元。公费出国旅游。而老师与公职人员待遇低、住房难仍很突出。这是社会风尚的大扭曲。

3. 学术文化商品化 高层次学术文化市场萎缩 低层次世俗文化市场猛增。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充斥，文风媚俗。传统文化变成一种新式文化包装，而一些珍贵文化遗产在经济热中被破坏。文物走私猖獗。这是学术文化的扭曲。

4. 社会生活中见物不见人 人文素养大滑坡 重理轻文 文科无用，基础学科冷落，基础科研下马，稀缺专业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传统的价值观基本解体。

5. 盲目崇洋风 洋货进口 深入一切文化与生活消费领域。出国潮、港澳海外移居潮“西化”潮 震撼中华大地。体育、电影、科技等方面大量人才外流。近十多年流走的大学程度的人才估计在 30 万人以上。在青少年一代中出现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

6. 人口素质反淘汰的危机 人口多而教育差 文盲与半文盲比重大 独生子女娇生惯养 都影响人口素质。对人口增长的控制 城市优于农村，知识层优于非知识层，加上人才外流，就会增大人口素质反淘汰的趋势。

以上六种扭曲现象，是文化教育适应向市场经济转轨而出现的新问题。一言以蔽之，这是人文生态的畸形化，其中有些是苗头与趋向 有些已形成一种“潮” 有些则是未来的隐忧。这些新问题，不仅会导致民族凝聚力的涣散，而且会给改革与发展带来很大的社会心理压力。对此，不能不引起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深层次的思考

○精神文化滑坡的历史反思

以上文化生态恶化的现象，并非中国现代化转轨过程中所独有，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与工业化的过程中已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我把它称之为赶超型发展战略引发的一种“发展综合症”。甚至在西方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已流行过不同程度的“发展病毒”。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潮引发的人文生态畸形化现象则具有中国的特色，它是历史的因素与现实的因素、内部的原因与外部的原因的错综复杂的交织。

就历史因素而言，长期以来奉行的阶级斗争路线早已造成知识贬值与文化虚无主义以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失落。这对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毒害尤深。当阶级斗争路线一旦转变为经济发展路线之后，便引起强烈的反弹。在市场与商品大潮的冲击下，诱发出强烈的实利主义与物质第一主义。

就现实因素而言，自改革开放、重新向国际社会敞开大门之后，为了迅速弥补过去丧失机遇的失误，加快追赶先进国家的步伐，这种历史紧迫感与人口增长的现实压力规定了大推进的高速发展战略，导致了重产值而不重效益、重自然资源开发而不重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行为。加之经济转轨时期法制不健全，政策倾斜过度，这样的经济行为就影响了人们的文化行为，滋长了唯利是图的价值观，诱发了“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尚。

再就外部因素来看，对我们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开放可以利用战后新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与“迟发展优势”，借鉴别人的经验，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而不利的是，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处于政治低谷与社会失序的形势下采取的面向世界的大转变，现实的反差特别强烈。这种开放立即给过去的封闭心态一个大冲击，造成了非常强烈的“文化震撼”。人们抱着

各种不同的目的涌出国门。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高消费的“示范效应”，诱使人们在人均低收入条件下追求高消费。特别是大量西方影视的放映，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与旅游业的发展，都对文化市场的导向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文革”期间造成的文化浩劫以及此后一个时期文化园地的青黄不接，更有助于港台与西方的商业文化产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

再深一层 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追根溯源。从“五四”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走的是仿效西方文明（后来是仿效苏维埃文明）、拒斥历史传统的道路；与此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走的是吸取西方文明但又同时保存传统的道路。近一个世纪以来，旧的传统文化已大大地失落与被破坏，而对新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又多是浮光掠影囫囵吞枣，故而文化层的新积累甚少，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太慢，这样对外来现代文化的有批判性的选择力与消化力就不很强，这也就是中国现代化延误的文化基因。自上而下的“斗批改”式的文化运动太多，自下而上的和风细雨的扬弃、消化、融会与传承太少。破得多而立得少，这似乎也是反传统中形成的传统了。

○从国际经验看市场经济与文化

任何改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高速度、大突进的发展战略不可能是和谐增长，只能是不和谐增长。这样，质量落后于数量，消费落后于生产，文化关注落后于经济关注。在相当一个发展阶段，对此要付出很大的牺牲，造成忽视与延误，这都是很难避免的，但必须有一定限度，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这个限度就是社会对这些代价的承受力，以及这些“牺牲、忽视、延误”在总结算时可得到弥补而不致付出超量的新代价。因此，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的人文生态的危机，只要及时引起极大的重视，采取相应的举措，是完全可以控制和加以扭转的。

有这样一些论点：或认为市场竞争是自然的优选工具 优胜劣败；或认为经济振兴自然会带来文化振兴；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世风败坏、腐化堕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等等，都涉及如何认识市场经济与人文生态关系的问题，目前在社会上仍议论不一，莫衷一是。事实上，这类问题在各国现代化过程中也大都出现过。我认为，参考一下国际经验，以为前车之鉴，对解决我国面临的难题会是大有裨益的。

1. 市场自然优选论。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崇拜市场万能。这种理论盛行于 19 世纪下半叶推行毫无约束的自由放任政策的美国。在美国是如何优化选择的呢？经济投机盛行，拜金主义盛行，让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支配一切，把社会问题放在一边。这个被马克·吐温称为“镀金时代”的美国变成了暴发户的天堂。社会矛盾的激化终于引起市民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反击，于是有“改革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的到来，引出强大的农民抗议与劳工运动，逐步推行了反托拉斯法、自然资源保护、一系列劳工立法，一直到罗斯福的“新政”加强了多种方式的监督与宏观调控。还须指出的是，美国的企业文化与市民文化都具有深厚的清教文化背景，这对唯利是图与拜金主义形成了一定的人文制约与文化调适。美国在这一时期大量的自由移民的输入，也形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更新社会活力的新因素，而不是什么市场自由竞争的优化选择。

2. 经济繁荣自然带动文化发展论。经济振兴是文化振兴的物质基础，但经济增长与文化辉煌灿烂并无必然联系。日本的第一次现代化片面追求富国强兵，经济腾飞带来了军国主义文化高扬；战后的第二次经济腾飞使日本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大国，创造了丰田模式的企业文化，但物质的丰裕却不能掩盖精神生活的贫困。作为“经济动物”的日本人的国际形象至今令人厌恶。尽管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注意保存了传统中的核心部分，社会一直比较稳定，但潜在的社会病态有增无减。台湾是精神文明被市场导向的另一个例

证。笔者去年去台湾访问，那边的文化学术界对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文化建设所造成的人文生态环境的败坏莫不深为叹息，并正在为走出这一困境探索文化新路向。近年台湾的官方大力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建立新礼俗，推行家庭伦理运动，以重建社会秩序。这些都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只是已积重难返，转移风气收效甚微。

3. 商品大潮必然败坏世风论。这听起来似乎振振有词，在历史与现实都有大量先例。其实这只是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自发进程中的常见现象，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的现代化是在完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的，但西欧的资本主义因素是通过长期渐进性的社会内部变革实现的，从封建私有制与个体私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换是自发演变过程，那里有市场社会与自治传统，有明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制规范，还有独立于世俗的教会系统，所有这些都对西方式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现代化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绝不能完全归之于市场的自律性与经济理性的神奇功能。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只可借鉴西方的经验，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在这方面，新加坡所采取的自主型选择性现代化的道路，其特点就在于在经济上自由放任，完全是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政治上却强化廉政立法来严惩贪污腐化，在社会上大力提倡讲清洁、讲卫生、重礼貌、重秩序、敬老睦邻的群众性宣传教育运动，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在学校开设世界宗教选修课，提倡儒家伦理。新加坡的东方式的资本主义，其社会秩序与风尚之好，为举世所瞩目。东邻的韩国也是通过出口经济导向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度，尽管奉行“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但在教育发展超前（各项教育发展指标在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惩治官场贪污腐败、抓“廉政刷新”与“新村运动”重视儒学传统等方面，都突出了发展战略的自主性与选择性，而不是裹挟在西方世界大潮中随波逐流。

人们常常谈到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事实上真正丰富的是我国的文化资源。这在世界上有独具的优势。离开了我们的悠久而博大的文化传统，就谈不上懂得中国的国情。我们一直强调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如果忽视了发展中的文化要素，则所谓的中国特色就只是一句空话。

（《东方》1994 年 6 月）

中国文化结构的解体与劫数

□王力雄

中国正在发生举世瞩目的变化，一般而言，目前多数对中国的观察、分析、评价和预言集中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变化之上，而把文化放在次要地位。经济、政治、社会是有形的，有实体，有数据，可以实实在在地把握，文化无形，到底能在中国社会变革中起到何种作用，难以道明，因此有意无意地把文化置于从属地位，以为其可以随有形的经济、政治发展自然演进（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会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类观点重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举出东亚儒文化圈的经济起飞为例。以那种论点推演，中国作为儒文化的源头之地，只要光大传统，前途亦将光明，甚至可能成为主宰未来世界的“大中华文化圈”之主体。今天，从表面看，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已从毛泽东时代遭封杀的状态全面“复辟”，不仅优秀的文化遗产重新受到尊崇，腐朽糟粕也一道沉渣泛起，是否可以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已得到恢复了呢？

更为乐观的观点认为当前的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地重归传统，而是与西方文化交汇融合，正在产生本质上的积极变革，从而获得更为蓬勃的生命力，很有可能为已经从整体上陷入穷途末路的人

类带来希望和出路。

我没有这样乐观。而且正因为我十分看重文化对社会的作用，所以就成了悲观。不错，我承认中国文化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变化并不等于就是良性的变革，还有可能是正在沦为解体。如果把一个民族的文化视为某种结构，我的确认为中国文化从结构上正在清晰无误地表现出不可挽回的解体之势。

○中国文化已丧失整合社会的能力

审美、娱乐、创造智慧、传播知识以及许多文化的功利性功能等无疑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来看，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却是对社会的整合——即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规范与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整合功能只能产生于文化的整体结构。如果结构解体了，中国即使有再多的京戏、气功、烧香拜佛、书法字画或飞檐式的大屋顶，也不能说恢复了文化及传统，而不过是些有如杂耍的幻影。

文化结构解体并非当今中国独自面临的问题。然而近代以来一向落后于世界主流的中国，这回却走在了世界前列。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完全是自然进程或外来压迫所导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政权自上而下进行“自觉革命”的结果。

与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是“家”。中国这种“家”文化的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四个字来概括。这四个字之中又以“孝”为根本。“孝”维系了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义务。“忠”、“孝”、“仁”、“义”是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上下纵横

互为支撑，形成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理的体系。

自‘五四’以来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寻求强国之路的摸索中，无论是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本质上都是对中国文化某种自觉不自觉地扬弃。而最根本的摧毁是在 1949 年以后，由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国家所有制，必然与原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发生冲突，从而形成家与国在结构上的分离——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根本性的解构。政府把“家”视为对国家的威胁，因此对中国文化结构中“孝”、“仁”、“义”三根支柱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所谓有利于国家的“忠”，并且将“忠”推向极端，把全体中国人纳入唯一一个“大家庭”——国家，忠于唯一一个“大家长”——领袖。这种倾举国之力以几十年时间所进行的摧毁是相当彻底的。“孝”让位给了“阶级性”——“亲不亲，线上分”；“仁”成了伪善的代名词；“义”等同于流氓团伙之间的关系。在那个年代，所有不顾个人家庭的行为都被树为榜样，至今那些为了‘革命工作’而父母有病不守护，或是着火时先救‘国家财产’不救妻子儿女的行为还被当作英雄事迹宣传；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亲属互相‘揭发’和‘划清界线’。民间社会统统被铲除，全部社会细胞都毫无例外地纳入国家系统。

那些年代的经历也从反面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能力，即便只剩一个孤零零的“忠”，也使立足其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堪与世间最狂热的宗教匹敌，使党超过一切神明，使毛泽东高于一切帝王。中国被整合得如同铁桶，连小脚老太太都手捧‘小宝书’跳“忠字舞”。

但是没有“孝”、“仁”、“义”从纵向和横向进行支撑，一个孤零零的“忠”是不可能不失衡的。其走向必然是越来越要求“忠”的唯一性，除了最高领袖，其他任何“忠”——哪怕是在其体系之内——都不能容忍。“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其他“忠”的一次总清除，各级官

员全被“拉下马”，连国家主席都被戴高帽游街，羞辱为“牛鬼蛇神”只剩下一个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和他指挥的“中央”。

毛泽东的撒手人寰带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份“忠”（他生时不与任何人分享 死时也就不可能让任何人继承）此后的改革 以发挥地方积极性为实现经济起飞的手段，在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 也在社会心理上消解了权威 把已成泥足的“忠”最后砍倒。

中国的文化结构就此全部倒塌，社会道德与伦理也因失去了可供攀缘的结构迅速枯萎。物质主义的泛滥对此雪上加霜，“独生子女”政策更加从根儿上瓦解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结构。失去了文化整合的中国人从几千年的群体状态碎裂为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体。与西方社会的个体状态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的个体状态有其个人主义的文化整合和人道主义的道德制约，中国的个体状态却完全是无制约的恶性膨胀。以往的由祖先、辈序、婚姻、亲属、朋友、世家、邻里等组合在一起的人际关系整合体系，今日已基本不复存在或遭扭曲。今日中国的家庭从数量上虽然位于世界之首，却由于家族文化结构的解体，只剩配偶结合与繁育后代的动物性意义，随文化结构的坍塌成为一盘散沙。

我如是说，并非认为文化结构应该固定，不需要有任何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相当多的糟粕，尤其难以适应近代世界与国际社会，不该不变，也不可能不变。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摧毁旧结构，没有新的结构同步产生和置换，社会就会因为失去文化整合而面临危机。

○什么都不信者什么都敢做

法律、制度、组织、强力机构等虽然都是整合社会的手段 然而把天生具有动物性本能的分散个体整合为一个有秩序、各归其位、

共同发挥合力的大规模人类社会，最有效的整合只能来自每个社会成员内心。只有每个社会成员的内心存在“自觉的法官”社会平衡和稳定才有保证，经济、政治的良好发展也才有可能——这就是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在。

由于文化结构解体带来的危机，可以用“脆化”形象地形容。社会“分子”——人与人之间失去粘性融合，“分子”水平的无序和冲突富集为整体状态紧张（脆化），法律和警察虽然能够一时保持社会秩序，却如同捆在玻璃器皿上的铁链，一旦有类似跌落那样的震荡，不但无法避免器皿粉碎，还会起到加剧的作用。

权威在传统中国是整合社会的重要机制。权威与权力的区别在于权威是从人心里被奉为神圣，受到自觉尊崇。然而当今中国人的心里几乎已不存在任何神圣，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无尊无卑、无大无小、无规无矩、无法无天。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整个国民精神趋向痞子化。所谓“什么都不信者什么都敢做”（Believe nothing, one can do anything），正是中国当今犯罪与腐败以惊人速度蔓延的根源所在。中国已出现全民腐败的症状，犯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虽然警察力量与经费成倍扩张，却日益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警察永远是少数，如果多数人不靠自觉，都要警察看管，结果只能是以少制多的局面，防不胜防。何况一人的罪案往往需要十倍甚至百倍的警力才能破获。如此高昂的成本，再随犯罪增加不断翻番，终有一天会达到不可承受的程度，使社会落入荒谬却真实的困境。

迄今人类社会结构都是立体的，存在层序、等级和分工。这种社会尤其不可缺少文化整合。仅仅靠法律和打手，是无法保持稳定的层序结构的。当年的中国下层人民以“认命”心态对待自身与上层阶级的差距，少数人的富有被他们视为与己无关的另一个世界，不为之不满，也不攀比，虽然阶级差距比现在大得多，却往往能维持稳定与合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消灭社会等级下手，虽然

事实上的等级照样存在，意识上的平等却已深入绝大部分中国人内心——尤其是经济上的平等。在这种社会心理面前，经济差距的拉大——正是近年中国的改革动力——必然会成为社会冲突的源泉。加之电视普及，把差距一览无余地展现，甚至夸大，在每一个人面前，对冲突的刺激就更为普遍和直接。在这方面，中国农民对自身地位的不满和改变地位的迫切愿望，势必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状态的重要因素。

农村对城市的敌意、农村失业人口形成的流民大军、农民犯罪增加等已经是当前中国的难题。这个多达八、九亿人口的社会群体之任何动向，累积效应都将是惊人的。同时农村又是政权控制最薄弱的部分，一旦失控，即使把几百万军队和警察全派下乡，也只好杯水车薪。观察中国历史，在所谓缺少文化的农村，从来都最是依赖文化传统而非官府和法律治理的。离开传统和文化，实现这个庞大群体的整合几乎不可想像，而今天中国，恰恰就面临如此现实。

○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

中国运行距离最长的客运列车——往返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列车，由于旅客精神病突发造成的暴力事件，去年一年高达八百多起。没有在中国坐过普通列车旅行的人可能难以想像其中道理。中国的列车大多挤得如同罐头，许多人只能终日站立，甚至一平方米的厕所也站立好几个人。空气污浊，令人窒息，喝不到水，无法排泄，四面肢体摩擦，难以行动。人人都在争取空间，神经紧张，火气积聚，冲突概率极高，却又没有缓冲余地，只能促进冲突发生和升级。

那趟列车途中连续行驶三天四夜，在如此狭窄恶劣的环境中忍受那样久，一些在正常环境下不显露任何精神病症状的人，常常就会暴烈地发作，或突然攻击周围的无辜者，或毁坏列车设备，或

砸碎玻璃跳车，或者自残甚至自杀……

——在我眼中，中国就是这样一趟列车。

文化结构解体撤除了每个人内心的“守门人”使人的欲望以前所未有的贪婪喷涌而出，那种贪婪乘以十二亿人口，堪称当今世界最大也是最可怕的贪婪。如果中国拥有对其人口而言足够的自然资源，也许还有缓冲余地，人可以向自然索取财富满足物欲。从每个人自身利益出发，也能认识到彼此合作比相互敌对要有利于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不幸的是，中国的人均资源实在太少。1995年9月世界银行推出衡量国家财富的新算法，把自然资源计算在内，中国的人均财富只能排名世界第162位（是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1/12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3。其中自然资本占的比例仅为3%（澳大利亚为71%））足以见中国人均资源的贫乏程度。且不说贪婪永无满足，即便像许多中国人宣称的那样，只求达到今天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人计算，实现十二亿中国人的美国梦，中国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60倍。注定了没有这种可能，于是满足欲望就只有选择另一条途径——互相争夺。

所谓争夺，不一定全是明火执仗违法犯罪，也许是巧妙地钻法律空子，也许是买卖中以次充好，也许是迫使工人延长工时，也许是捡了别人钱包不还……分开看，都是小事，只会引起局部小的摩擦和冲突，无关宏旨。问题是如果所有社会“分子”都在进行这种损人利己的争斗、算计和疏离，经过阶梯式的积累、富集和传递，就会加强社会整体的“脆化”，酿成宏观政治和经济的大风大浪，甚至最终导致社会解体。

因此，我以为对将来中国最真实的前景和最深刻的危机并不在经济、政治方面，而是文化结构的解体。单纯的经济、政治都在社会的浅层次，即使有危机也不难度过，文化结构解体所导致的精神紊乱，却会从根上毁掉一个社会。我这样说，还包括对时间因素的考虑。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可以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得到调整甚

至重建，文化结构的形成却必须经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演进——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文明的形成都无例外——并且文化结构不能由人为设计和建设，所以一旦解体，就等于再无依托。目前开展的“精神文明建设”之无效，已经说明了这种无奈。

当然，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马上就会导致社会发生解体。几代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也许浑然了无在劫难逃的感觉。把青蛙放进沸水它马上就会跳出，而若把凉水慢慢加热，青蛙就会浮游在水中舒服地昏睡，最终不知不觉地死亡。人类历史上曾有那么多辉煌的大文明衰落消亡，没有理由认为今后不会重演，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会落入那种命运。

以上所谈已足够悲观，然而事实上危机并非只限于中国，各国的区别只在程度。看今日世界，无论是东方西方，精神的大厦都在崩塌。男男女女们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迷茫，心理疾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人与人相互为敌，冷漠残忍，宗教信仰萎靡，精神理想破灭，真理和信念被相对主义腐蚀，人生意义变得越来越虚无；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达到从未有过的广泛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却变得日益模糊，形同陌路；由此导致的社会麻木、冲突或失衡已成为遍及全球的尖锐难题。

我想，为了免于沉沦劫难，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古老智慧中去寻求启迪，但是也必须保持清醒认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身后已决裂出不可复归的鸿沟，即使此刻重新意识到保守的价值，能让我们保守的也已所剩无几。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而且只有向前，才能寻找走出废墟之路。

我不知是否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只有努力。